

2019.9.25(Y-Research RN098)

作者：黛安·科伊尔 (Diane Coyle) /剑桥大学公共政策学教授

翻译：邵玉蓉/第一财经研究院研究员

shaoyurong@yicai.com

## 经济发展之谜

目前的学术研究——例如对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创新经济学，以及对管理质量的研究——或许正在制造更多的谜团。但与此同时，关于经济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一些问题甚至尚未找到恰当的角度。

我们是否了解经济是如何发展的？现实似乎在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了解经济是如何发展的，那么在目前这一低增长的时期，每一个国家的表现都应该比现在更好。事实上，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例子非常罕见，例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的日本，或者 20 世纪 70 年代后的一些东南亚国家。这样的例子是如此罕见，以至于人们常常将其称为“经济奇迹”。

然而，软件基础设施公司 Stripe 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利森 (Patrick Collison) 和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 (Tyler Cowen) 于近

期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倡建立一门大胆的、全新的、跨学科的学科——“进步科学”(science of progress)。文章一经发布便引发了学者们的热议。

许多人指出，大量的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已经涉及了科里森和考恩所提出的“进步研究”(Progress Studies) 这一新学科所包含的问题。如今，许许多多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各种不同的问题，例如，各地所涌现出的技术集群社区(如硅谷)是因何产生的？为何工业革命诞生于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为何一些组织机构的生产率和创新能

力要比其他的组织机构高出那么多？正如牛津大学的吉娜·内夫（Gina Neff）最近在 Twitter 上发表的评论中所写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是工业革命给予了社会学生命[她将社会学称之为“进步研究 1.0”（Progress Studies 1.0）]。

上述种种的确都是事实，但是，科里森和考恩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学术研究人员显然已经感受到很难推动跨学科的合作，而学界却一再呼吁他们更频繁地去进行这样的合作。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学界所采用的激励措施所造成的。学界往往鼓励学者专攻极度细分的某一领域，以便他们能够在日后发表一些可以给自身带来晋升机会和职业声望的内容。人们常说，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大学里也有各种各样的学科。因此，像我和内夫所处的这类跨学科研究机构必须仔细考虑清楚该如何最好地推动年轻同事的职业发展。和大学一样由许多不同部门所组成的政府如今也面临着相同的孤岛问题。

此外，研究领域中所存在的流行趋势会导致一些研究领域充斥着研究者，而另一些领域却少有人问津。以人工智能的伦理问题为例。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真的是当今研究领域，甚至是人工智能或伦理这两个细分领域中，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吗？在我看来，在分析这些科技公司的行为时，它们的商业模式中所蕴含的财务诱因，应至少获得与其公司道德相等的重要性。

与此同时，奇怪的是，一些重要的经济问题却没有被充分探讨。例如，卡尔·弗雷（Carl Frey）在他的新书《技术陷阱》（The Technology Trap）中详细阐释了他对自动化对未来工作的影响这一问题所持的悲观看法，指出了最初的工业革命对普通工人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但他同时指出，自动

化进程后期，也就是 20 世纪中期的大规模生产时代，是一个就业率高且日益接近大规模繁荣的时期。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两个时代所呈现出的巨大差异？

更普遍地来说，研究人员需要以一种能让决策者更易理解的方式去提炼他们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当这一研究领域中存在着重大的学术分歧时——并说服决策者根据他们的研究成果来采取行动。然而，尽管学术研究获得了公众的普遍信任，但是，大多数学者与他人的沟通能力较差（这再次反映出了专业激励对研究人员所产生的影响）。此外，一些政客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证明了他们所深深信仰着的某个信念不成立的证据。而那些思想开明的官员也常常难以在学术和知识层面找到易于理解的专业意见，尤其是在新兴科技领域。

如今，在改变社会行为这件事上——无论是改变政府官员还是企业与公民的行为——研究所扮演的角色成为了西方民主国家所广泛面临的合法性危机的一部分。截至本世纪初期，主导大局的一直是技术官僚——尤其是经济学家，而政府也将大量的政策制定和研究授权给例如中央银行和公用事业监管机构等独立的专业机构。然而，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随之而至。此后，许多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绝望至死”（deaths of despair）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因此，“专家意见”在大多数公众中失去吸引力的这一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便引出了“进步科学”的必要性的最后一个要点：我们所谓的“进步”究竟是什么？我们应当如何度量进步、监测进步？而谁又体会到了进步？由于种种原因，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这一将人们所真正重视的一些因素剔除在外的标准指标——将不再适用。

围绕着“进步”的辩论，引出了深刻的政治和哲学问题：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社会。如果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目前看来很有可能），那么社会分裂和政治的两极分化将进一步加剧。然而，我们自世纪之交以来所得到的明确信息是，如果大多数人没有体验到进步，那么社会根本没有在真正地进步。

目前的学术研究——例如对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对创新经济学，以及对管理质量的研究——或许正在制造更多的谜团。但与此同时，关于经济发展的许多关键问题仍未得到解答，一些问题甚至尚未找到恰当的角度。（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